

XINCAILIAO XINFANGFA XINSHIYE

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

中国

ZHONGGUO GUDAI GUOJIA
HE SHEHUI BIANQIAN

古代国家 和社会变迁

宁 欣 主 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XINCAILIAO XINFANGFA XINSHIYE

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

中国

ZHONGGUO GUDAI GUOJIA
HE SHEHUI BIANQIAN

古代国家
和社会变迁

宁 欣 主 编

k207-53

2/607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变迁 /
宁欣主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303-12022-2

I. ①新… II. ①宁… III. ①中国—古代史—文集
IV. ①K20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3374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55 mm × 235 mm
印张：23
字数：379 千字
版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策划编辑：李雪洁 责任编辑：李雪洁 刘松弢
美术编辑：毛佳 装帧设计：毛佳
责任校对：李茵 责任印制：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序言

北京师范大学是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著名高校，前身是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我国第一所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学科是北京师范大学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演变而来。在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者，如李大钊、钱玄同、邓之诚、朱希祖、王桐龄、张星烺、楚图南、陈垣、侯外庐、白寿彝、柴德赓、赵光贤、何兹全等，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辛勤耕耘过，奠定了北师大历史学科坚实的基础。

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是我国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内最早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并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单位之一，是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211”工程、“985”工程国家重点建设单位，是北京市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其中国古代史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

青年学者是学术界的后备力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一贯重视青年学者的培养工作。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发展，加强海内外青年学者尤其是在校博士研究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促进青年学者成长，2009年8月29至3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变迁”国际研究生学术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

本次论坛有来自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以及我国两岸著名高校的六十余名研究生参加，并特邀十位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莅临点评。与会青年学者的研究方向涵盖了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史、蒙元及民族史、明清史；提交的论文涉及政治制

度、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宗教信仰、医药观念、环境意识等方面，既有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也有新兴的医疗史、环境史研究。研究材料除了传统史籍之外，地方家谱、官府档案、出土简牍及文书、墓志碑刻、墓葬壁画等材料的运用也都受到青年学者的高度重视。

“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变迁”国际研究生学术论坛下设三个子论题：第一，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变迁研究中史学研究新方法的运用；第二，从新的研究视野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的变迁；第三，新材料的新诠释。重点讨论了如下问题：

21世纪以来，新获出土文献和考古发掘，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同时引发新的思考，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变迁在新材料与新思维的语境中，是如何开拓和不断深化的；如何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来认识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通过研究，如何彰显中华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和贡献。

与会青年学者（多是海内外著名高校的优秀博士生）的论文主要就中国古代社会某一领域或某一问题进行专论，作者既重视考证，也强调理论，功底扎实，思维敏捷，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和看法。此次，我们将部分与会论文编辑成书，以期能更好地推进海内外青年学者的学术文化交流，促进青年学者的成长，加强海内外青年学者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本次国际研究生学术论坛的召开及论文集的出版，得到国家“211”工程、北京市“国内外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建设”专项资金、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专项资金的资助；得到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的支持和帮助，得到历史学院的鼎力支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雪洁编辑为论文集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特此一并致谢！

2010年12月18日
宁欣

目 录

试论春秋时期的政治平衡体

——兼论其与法家思想的关系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侯 磊(1)

礼制和礼意

——刘文淇、刘毓崧父子以周礼解《左传》释例

..... 南京大学文学院 顾 迁(10)

试论孔子为政思想的深化

——以孔子与鲁国季氏关系为线索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高婧聪(18)

上博简《恒先》“或”的考论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黄鸿春(29)

秦汉戍卒赴边问题初探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赵宠亮(40)

走马楼简中的成年待嫁女和未成年已嫁女

.....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徐 畅(52)

汉代王侯朝觐奉璧原因试探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尤 佳(64)

自然灾害与新莽时期的社会动荡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曾 磊(73)

汉晋陈留圉地考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石 静(84)

东魏北齐“邺—晋阳”两都体制形成原因探微

..... 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现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崔彦华(93)

《文馆词林》载北齐三帝即位大赦诏所见高齐皇位继承制度

.....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姜望来(102)

从石刻史料看北朝隋唐时期泽潞地区的民族构成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韩棣尧(115)

唐宋时期《帝王略论》的利用状况 ... 日本明治大学 会田大辅(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陈 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李荣华(译)(131)

《晋书》修撰与唐初政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张 龙(141)

隋唐京兆韦氏居所考

——兼论士族的城市化 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现陕西渭南师范学院 马建红(150)

唐代德之际中枢政局发微

——以常袞、崔祐甫之争为中心

..... 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现国家图书馆 胡 平(162)

甘露之变的历史定位

——以政治文化研究为视角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范世昌(172)

唐、宋进奏院比较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李 永(182)

淮西节度使的变迁

——“胡化”与区域背景下的考察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武 强(192)

五代江陵城考论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张跃飞(204)

唐宋时期文人岭南意象的嬗变

——以宋之问、韩愈、苏轼为例

..... 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李荣华(213)

《武经总要》纂修考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姜 勇(223)

政治空间与制度运作

——试论宋代的“二史直前奏事”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王 鹏(232)

宋太宗朝“将从中御”政策施行考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田志光(241)

桥梁修建与士人参与

——南宋士人与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关系研究之一

.....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宋燕鹏(250)

山东灵岩寺《敕赐十方灵岩寺碑》研究

.....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胡孝忠(266)

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

——以 11—13 世纪蒙元对汉蒙民族的影响为例

..... 德国弗莱堡大学历史系 袁 剑(277)

宋明时期湘西社会变迁与族群认同

——以白帝天王信仰及故事建构为例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龙 圣(286)

明清时期的军户移民与宗族建构

——以韶山毛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李 扬(295)

雅克萨之战前后的达斡尔五百官兵考述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金 鑫(306)

读图时代与水利国家

——河渠水利图与康熙朝河政.....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席会东(317)

清代医药观念探析

——以服用大黄为例.....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董 琳(329)

嘉道时期学风变迁与史学嬗变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赵少峰(337)

信仰、权力与身体

——新文化史视野下儒、释、道三教处理发须的比较研究

.....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郭 焜(347)

团结与对抗：两种对中国穆斯林妇女的解读

——读《中国清真女寺史》

..... 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现宁夏医科大学医学院 罗彦慧(356)

后 记..... (360)

试论春秋时期的政治平衡体

——兼论其与法家思想的关系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侯 磊

在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中，无论是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还是诸侯国内部各卿族^①之间的内斗，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都存在着一种可称之为是政治平衡体的机制。所谓的政治平衡体，是由于种种主观、客观上的稳定性因素，从而在诸侯国之间、各卿族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动态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体虽然并非外在化的机体性组织，更非制度性的存在，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是决定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

法家思想虽迟至战国时期成为一有系统的学派，但其渊源定为更古。对于诸子起源说的认识，不论是“王官说”、“时势说”还是“职业说”^②，各有所见，不能偏废。但法家思想对以“法制”为主的外在规范的重视，是伴随着社会制度的剧变而来的，本质上属于社会转型期对重建统治秩序结构的寻求，这点应无异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春秋时期“救世”的现实需求中来探寻法家思想的发展轨迹，自然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由此以来，在春秋时期所存在的政治平衡体，就必然地影响到了在这个时期实际执政者中的政治实践和相应的观念中，逐渐衍生出来的早期法家思想。

① 因为卿、大夫常常难以划分，故本文所谈的卿族，有时也包括大夫在内。

② “王官说”见本于刘歆《七略》的《汉书·艺文志》，章学诚、章太炎等从之；“时势说”见《淮南子·要略》，胡适主之；“职业说”见傅斯年所著《战国子家叙论》，胡适在其《说儒》文中已从傅说。

晋国和郑国是春秋时期饱受“内忧”和“外患”的典型代表，残酷的政治斗争使得两国都是图存求变的先锋派。郑国虽在战国初期为韩所灭，政治上法家式的变革和实践没有得以延续，但子产却是春秋时期在法家学说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先驱。与此不同，晋国最终在多门内斗中分为三晋，在这个背景下最终胜出的韩、赵、魏三国，是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动力之源，与后来法家直接具有实践上的连续性。本文我们以这两国为中心，论述春秋政治格局中存在的平衡体及其与法家思想的关系。

晋国和郑国所面临的“内忧”和“外患”，是春秋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一方面，是原有的以王族为中心的氏族共同体解体，原有政治秩序被打破，使得各诸侯国纷纷开疆辟土，扩充实力；另一方面，这个时期，是从封建宗法制到集权的官僚制，从封邦建邑到郡县制，从家臣门隶到编户齐民的转型时期。在这个大形势之下，小国被大国所吞，从卿族降为皂隶的不在少数。但这个过程的进行自然又不是平稳的、自愿放弃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着激烈到生死存亡的斗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斗争的残酷性，会促使斗争双方不断的实施一定程度的改革措施以增强实力。由于面临的环境不同，这些改革又大致可分为两个面向。晋国的改革多是各卿族在其辖土内进行的，郑国则是国家在强宗主主持下所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正是这些对政治和社会结构做出调整的一系列改革，带来了政治上理性化和效率导向的提升^①，为早期法家思想的衍生提供了沃土。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虽有内忧、外患之虞，但竞争并没有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相比于战国时期大规模的、全民性的吞并战争，这个阶段本质上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过渡期。从反映这个时期的最为可靠的史料——《左传》中可以看出，终春秋之世，虽灭国众多，但大多是戎狄之地和弱小之国，二流以上的强国基本上并没有真正的亡国之机。这种相对稳定、相对克制的局面，并不是由政治平衡体所决定的，但政治平衡体又不仅仅是这种局面的表现而已。毋宁说政治平衡体是这种相对稳定

^① 采自赵鼎新所称的“战争驱动型理性化”(war-driven rationalization)及“效率导向型行为”(efficiency-driven behavior)。赵氏以此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工具理性”交替使用，是为了避免这个概念沾染的线性进化论嫌疑。参见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诞生》，19～22页，夏江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局面的一种结果，反过来这个结果又强化了其赖以形成的原因。

前辈学者对春秋时期政治格局相对稳定、平衡原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外在方面。春秋时期的大国，尤其是晋、楚等一流大国，基本处于均势的局面。大国之间的均势虽然迫使小国不得不在外交上采取骑墙态势，但它们作为大国纵横的重要棋子，却又有着不容忽视的战略意义。以郑国为例，因为晋、楚长期争霸，又“势处辽远，地非犬牙相辖”^①，这就使得对郑的争夺和控制成为关键。一个明显的例证见于《左传·襄公九年》所记，晋以诸侯师伐郑，郑人恐，乃行成。中行献子曰：“遂围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不然，无成。”知武子曰：“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人。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从中可见晋国欲用郑牵制楚国的策略。正是由于大国实力基本均势所产生的巨大牵制力量，导致郑国虽然面临着种种危机，但楚能灭陈、蔡，而绝不可能灭郑。从这个层面上讲，这个时期的稳定局面是由大国间实力的相对势均力敌所决定的。

第二，内在方面，是自西周中期以来封建危机的加剧。这在西周时期主要体现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表现在周王室的控制力益弱，诸侯国的离心力益强。春秋时期周王室已经只是名义上的共主，诸侯国与王室之间的离析木已成舟，已无危机可言。这个时期的封建危机主要体现在诸侯的二级甚至是三级分封上。作为封建贵族的卿大夫集团的势力日益强大，从而造成了权力的进一步下移。这是封建危机继续深化的表现。对于这种危机对春秋形势的影响，赵鼎新分析道：“在发生了封建危机的国家中，一般说来，国家越大，危机的规模就可能越大。原因很简单：国土越大，封建贵族的领土与势力也可能越大。……由于领土扩张直接带来了二级封建化的种种问题，因此许多国家在二级封建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后便不再热衷于开疆辟土，战争的性质也随之起了很大的变化。”^②

第三，制度方面。从西周灭亡到齐桓公霸政，近一个世纪的春秋前期是列国混战的局面。但自齐桓公起，霸政这种新的政治制度得以建立。“这种制度能够把西周灭亡以后已经互相冲突混战了约一个世纪的

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二“晋楚交兵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180册，31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②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诞生》，80～81页，夏江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散沙一盘的中原各国整合起来。”^①这种新的政治制度，是西周宗法制度解体以后，中原众多城邦国家，在长期以来积累着的各氏族间文化融合的基础上，以“诸夏”为旗帜，以贵族文化传统为其内在组织力量，建立起的一种城邦国家联盟。它导致了历史的转折。

从大国均势、封建危机和霸政体制三个方面入手，足可认清从春秋初期列国混战到之后相对稳定的原因所在。我们可以再具体到郑国来说明之。在春秋初期，郑国尚有险要之地可以依凭，“是时郑西有虎牢之险，北有延津之固，南据汝颍之地，恃其险阻左支右吾。”^②另外尚且有大国之间互相牵制的巨大力量及霸政的稳定性因素所在。到了春秋后期，这种种因素有所减弱甚至不复存在的时候，楚外受制于吴，内受困于乱，晋也因内斗而无暇于外。郑又依于子产等政治家的才能而得以保全于春秋之世。正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郑国虽有亡国之忧，生存于大国的夹缝之中，实际上却并没有真正的生死存亡危机。如果没有这种相对稳定的过渡局面，春秋后期子产在郑国所采取的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断然是无法实行的。

二

春秋时期政治结构中的平衡体，不仅表现在上文所见的诸侯国之间，而且表现在诸侯国内部的卿族之间。所以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仍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前辈学者从三个方面对春秋稳定性因素的探讨，足以解释这个时期国际形势的平和，有助于我们对诸侯国间政治平衡体的认识，却不足以解释卿族这个层面上的平衡体状态。这个层面上的相对稳定，对各卿族在内部实施的改革至关重要。而早期法家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些追求实效的改革中逐渐衍生出来的。下文中，我们将以内斗最甚的晋国卿族为例，来说明卿族这个层面上政治平衡体的情况。

晋国政治平衡体的表现是晋君为共主，各卿族轮流执政。这个平衡体同样有着复杂的因素在内，其中牵涉卿族与国君的关系，卿族内部的关系和卿族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包含着重重矛盾的脆弱的平衡体，其中的任何一种关系出现问题，都会引起平衡体的动荡，但都无法改变这种相对平衡的局面。

① 颜世安：《“诸夏”聚合与春秋思想史》，载《南京大学学报》，2003(5)。

②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四“列国疆域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179册，295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国君引起这个平衡体的动荡，最明显的莫过于厉公。鄢陵之战后，厉公一方面欲以其左右代群大夫；另一方面又欲夺群大夫之田，《国语·晋语六》记鄢陵之战前范文子不欲与楚战，理由即为若战胜“吾君将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敛，大其私暱而益妇人田，不夺诸大夫田，则焉取以益此？”正可见国君与卿大夫的利益冲突所在，国君欲益封近幸和爱妾，土地只有从卿大夫中强夺。本质上应该是他实行中央集权的尝试。厉公虽杀三郤，却因不忍杀栾、中行，而反被二氏所弑。对此，童书业就颇为遗憾，他说“使是计划告成，则晋国可能于此时逐渐转入中央集权官僚体制。”^①晋厉公的中央集权自然不会只是因不忍于栾、中行二氏而导致失败的，当时卿族的整体实力已在国君之上，即便是杀了栾、中行二氏，也难讲其他卿族不会联合起来弑君。就像是晋出公“欲以齐鲁而伐四卿”一样，自会招来四卿的联合反攻，从而“奔齐，道死”^②。在当时政权已经下落的情况下，任何国君的集权尝试终究都是会失败的。

国君尝试集权往往又与卿族内部的斗争和不平牵连在一起^③。两者常常相互为用，会引起政治上的动荡，却仍不足以动摇这个平衡体的存在。因为在这个平衡体内，最重要的关系是当时实际掌控制权力的各卿族之间的关系。

六卿^④是晋国最有权势的贵族集团，所指为三军将佐。一些文献称六卿为“六将军”，也可说明这一点^⑤。晋在将佐之外，应还有散卿存在，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亦未有军行”。杜注曰“虽登卿位，未有军列”。另外，还需说明的是大傅、大师这两个官职。《左传·文公六年》记“晋蒐于夷，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军”。按照《公羊传》和《穀梁传》的记述，这次“蒐于董”，时任大傅的阳处父力主废狐射姑而立赵盾。并且“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⑥许倬云据此判断大傅、大师是“位置极高的官职，其权可以选择执国政的

①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6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② 《史记·晋世家》。

③ 如先氏、栾氏等族的灭亡，都有国君利用卿族内讧的因素所在。

④ 有时为十卿、十二卿，这与晋国的军制数量有关，本文通称为六卿。

⑤ 如《墨子·非攻中》：“昔者晋有六将军”。《淮南子·道应》：“赵文子问于叔向曰：‘晋六将军其孰先亡乎？’”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吴问》：“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

⑥ 《左传·文公六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5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中军帅。”^①这个判断应有问题，即便这两个官职极高，其可以选择中军帅也很值得怀疑。因为一旦如此，那这两个官职堪称是晋国最有权势的职位了，这与事实不符。杨伯峻即认为阳处父改中军将之事出自《公羊传》、《穀梁传》，从而“自不可信”^②。大傅大概只是“主礼刑之近官”^③，这个职位也“不常设，卿或大夫皆可为之”^④。所以在晋国军政合一的体制之下，六卿应该是当时晋国最有权势的卿族，何况中军将自文公后一直都是为政的，相当于后世身兼最高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

出任过中军将这个最高职位的卿族，有郤氏、先氏、赵氏、范氏、栾氏、韩氏、知氏、中行和魏氏，这组成了晋国最有权势的卿族集团。几大卿族轮流执政，本身就是平衡体的一种表现。正是先氏、郤氏和栾氏的灭亡，才形成了晋国六卿专权的局面。这三卿族的灭亡，自然有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但其共同点是同样显著的，即三族都不是因为势力相对较弱，恰恰相反，三族亡时都是因为相当强盛，从而因过于骄横而导致多怨，打破了卿族间平衡体的状态。

以三郤的灭亡为例，《国语·晋语八》记“夫郤昭子（即郤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宠大矣。”《国语》中对郤氏势力之盛的描述难免有所夸大，却也可见郤氏之强盛。正因为此，郤氏难免“恃其富宠以泰于国”。在卿大夫间的争权夺势中，三郤（郤至、郤犇、郤錡）因“争田”、“夺妻”等骄横^⑤，不仅得罪了多位卿大夫，与厉公宠臣胥童也有积怨^⑥，而且因鄢陵之战中郤至不听栾书从而得罪了当时为政的栾氏^⑦。再加上“晋厉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⑧在这种积怨重重的情况下，三郤被杀，“皆尸诸朝”。

除郤氏之外，《左传》中记载的先氏、栾氏、范氏、中行氏的灭亡，都不出这个范围。最为明显的莫过于知氏，在平范氏、中行氏之乱后，

① 许倬云：《求古编》，268～269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② 《左传·文公六年》，545页。

③ 《左传·宣公十六年》，768页。

④ 《左传·襄公十六年》，1026页。

⑤ 《左传·成公十一年》、《左传·成公十七年》，854页、900～901页。

⑥ 《左传·成公十七年》，“胥童以胥克之废也，怨郤氏”条，事见《左传·宣公八年》，697页。

⑦ 《左传·成公十七年》，“栾书怨郤至，以其不从己而败楚师也，欲废之”条，900页。

⑧ 《左传·成公十七年》，900页。

晋政由知、赵、韩、魏四卿所把持。“当是时，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①可见在四卿中知氏的势力又最为大，但这时知伯“欲尽并晋”，最终却被赵、韩、魏联合起来所杀。《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记载知伯“愎而好胜”、“贪而愎”，《国语·晋语九》记知伯“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这都是知氏实力最强反被三家所灭的原因。但更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知氏想改变这种共同执政的局面，即“欲尽并晋”，也就是说想通吃。这无疑为卿族间形成的政治平衡体所不容。联合灭知氏后，三家分晋各为诸侯，而不能像田氏代齐那般一家代晋，实际上仍然是这种平衡体无法彻底打破的表现。

如上文所见，遭遇灭顶之灾的卿族，都是由于族内内乱、被国君所利用，加上与其他卿族间矛盾重重所导致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终分晋室的三氏。赵氏虽然由于内乱及与部分卿族存在矛盾而出现过两次危机，几乎灭族。但一次赖韩厥之力而复立，一次赖韩、魏之请而定^②，都得以重兴，很重要一个原因就在于有其他卿族所保。《左传·昭公三年》记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争州县之地，却都因无正当理由而舍之，而后赵文子为政，有人劝其取州，赵文子以其会带来祸患而终不取。韩宣子为政时，子产归其地于宣子，韩宣子告晋侯后，晋侯与之。但宣子仍“为初言，病有之”。《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魏献子为政，分祁氏、羊舌氏之田为十县，以功以贤分之，余，与其庶子魏戊一县，尚且担心“人其以我为党”。这些事例都能反映出韩、赵、魏三氏在平衡体制衡下，在激烈的斗争中仍保持着相对的克制，更不能有一家独大和通吃的念头。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内斗中灭亡的晋国各卿族，都不是因为实力较弱而被灭^③，恰恰相反，都是在实力鼎盛之时，因为客观或主观上威胁到了政治平衡体的存在，才被消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卿族间因为相对的势均力敌，而在斗争中显得颇为克制。这个平衡体的存在，对卿族间的内部改革至关重要，正如相对稳定的国际形势使得郑国有条件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一样。晋国在卿族内斗中这个平衡体的存在，同

① 《史记·晋世家》。

② 《左传·成公八年》、《左传·定公十三年》，839页、1591页。

③ 公族的情况较为特殊。虽然晋国的公族实力相对较弱。但祁氏、羊舌氏被灭后，分祁氏之田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为三县。据《昭公五年》所记，韩宣子为政时也只有七县而已。虽然县制大小可能有不同，却也可见公室之弱是相对于整个异姓卿族而言的，其亡多是被六卿出于弱王室的目的而联合所灭。

样为各卿族在其内部实行一系列的改革创造了条件。同时，这也决定了此时不可能出现像战国时期那样大张旗鼓的变法运动，而正是发生在战国前、中期各国的大规模变法运动，是法家政治真正形成的时期。

三

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和卿族，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压力。子产为“救世”，卿族为图存和扩张，他们所面临的政治压力和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带来了对政治理性和效率导向追求的提升。解决这种“救世”的现实需求，必然以富国强兵为手段。春秋时期，实际的执政者^①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其手段，虽然没有商鞅将治国归为农战那么简练而纯粹，实际内涵和直接目的却已不出商鞅所言。正是这种具有政治理性的改革，客观上提供了具有政治理性主义色彩的法家思想诞生的沃土。

另一方面，春秋时期无论是诸侯国间的开疆辟土，还是卿族之间的激烈内斗，都由于相对均势的格局导致了整体上的相对稳定。这使得春秋时期所面临的生死存亡，远没有战国时期那么残酷。战国中后期，所谓的纵横家之所以能够如此盛行，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各国在纷纷完成变法后，政治和社会上的结构调整基本完成，大规模的全民战争导致战争过于残酷和白热化，这时各国已经无暇再进行内政上的改革和修炼，而只能靠说客^②来暂时缓解燃眉之急。

相比于此，春秋时期由于政治平衡体的存在，有着相对平和的形势。这延长了诸侯国和卿族改革的过程。各诸侯国(各卿族)有较为充裕的时间，使得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变革一步步发展，这是早期法家长期缓慢发展、积累的重要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礼义政治观念始终有 its 重要作用，它的影响是逐步淡化乃至消除的。春秋时期也尚未能全然摆脱尊礼重信的贵族文化特征，但礼崩乐坏的旧秩序的瓦解，所带来的新

① 这种政治实用理性，在春秋时期，是只能在实际执政者中才能产生的。这在著名的关于“刑书”、“刑鼎”的争论中看得非常清楚。子产等实际执政者迫于现实压力，顺应政治形势颁布了“刑书”、“刑鼎”，实际上是政治上依于制度运作的一个雏形。对此提出严厉批评的叔向和孔子，最可注意的是这两人的身份和地位，前者明哲保身于卿族内斗中，后者终身在政治上不得志，都不是实际的执政者。正如子产给叔向的回信中所表示的那样，或许他能在道德价值上接受批评，但他所面临的是更紧迫的是现实的政治目的——“救世”。可见相比于叔向、孔子，实际执政者显然要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形势和现实的政治功利。

② 当然有部分纵横家强调的是为政者的理性决策，但相比于法家强调社会结构性改革，相当一部分所谓的纵横家可以称之为是说客。

形势下的治理方式，是春秋时期更为迫切的时代要求。正是这种过渡期的混融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旗帜鲜明的法家学说尚不能大张旗鼓的出现在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法家创建一个最大限度增强国家财政收入和军事实力的全权国家相比，这个时期还只是局限于对个别的社会结构和政策进行调整。正如在制度上战国时期的焕然一新，一一都能在春秋找到其痕迹一样。战国时期旗帜鲜明，跃为一大显学的法家思想，也正是在春秋时期的混融和复杂中逐渐衍生出来的。